

# “数据主义”的人文批判

高兆明

**内容提要** “数据主义”是一种视一切为数据并以数据为中心的世界观。“数据主义”以造福人类的人道理由成为一种“人文主义”，并取代传统人文主义成为“后人文主义”。“数据主义”是对数据技术的神话。尽管数据技术不同于既往技术，但数据技术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技术，无法摆脱技术本身的局限性。人的本质不是数据与算法，而是自由意志。数据技术是自由意志活动的产物，数据技术的社会功能在根本上取决于掌握数据技术的人。

**关键词** 数据技术 数据主义 人文主义 后人文主义 “数据洞穴”

高兆明，上饶师范学院教授 334001

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210023

21世纪将是数据时代。数据技术正以超出想像的速度进入日常生活，并对人类生活产生广泛深刻影响。有人预言人类有可能发明出“终极算法”，它能自主学习、自我编程，能根据所获数据作出判断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它将颠覆人类既有认知与生活方式<sup>[1]</sup>。有人认为“数据主义”将取代“人文主义”<sup>[2]</sup>。“数据主义”真的会取代“人文主义”吗？“数据主义”取代“人文主义”意味着什么？人类正处于“天堂和地狱的岔路口”<sup>[3]</sup>。当今人类较之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紧迫地有赖于人文精神引领。

## 一、“数据主义”：21世纪的“后人文主义”？

“数据主义”是一种视一切为数据并以数据为中心的世界观。数据主义不仅是“21世纪最大的科学挑战”“最紧迫的政治和经济议题”，还是最重要的人文精神挑战<sup>[4]</sup>。“数据主义”的兴起以信息、生命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智能机器人’伦理问题研究”(17BZX021)阶段性成果。

[1]参见[美]多明戈斯：《终极算法：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如何重塑世界》，黄芳萍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33页。

[2][3][4][以色列]赫拉利：《未来简史》，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356-357页，第353页，第352-353、356页。

技术的爆发式发展及广泛迅猛应用为背景。“数据主义”不仅表达了现代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信念,而且还表达了对人类未来生活样式、存在意义的理解。赫拉利在《人类简史》《未来简史》中对21世纪的预言未必完全合理,但却尖锐地提出了21世纪人类生存境遇、数据主义及其批判等重大问题。赫拉利警告人类:追求造福人类的人文主义梦想有可能“导致人文主义的崩塌”,“数据主义”将取代“人文主义”并成为一种新的世界观或宗教,应当警惕与批判“数据主义”<sup>[1]</sup>。这一警告并非危言耸听。

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是人类近代以来确立起的基本文明价值观。正是以人为中心的人文精神,使人道、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成为社会主流价值。即使历史进程有过诸多曲折,但是,向着自由、解放这一目标前行,仍然构成人类社会的主流与基本趋势。然而,数据技术有可能颠覆人类近代以来所确立的基本人文价值精神与生活秩序,基于数据技术的“数据主义”有可能“把人推到一边”,“从以人为中心走向以数据为中心”。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从“以人为中心”走向“以数据为中心”的世界观转变,并不只是一场停留于观念中的哲学革命,而是能“真真切切”影响人类日常生活诸方面的日常生活革命。它直接高举造福人类、给人类带来幸福快乐的旗帜,以人道的口号占领日常生活的每一领域、每一角落;它不仅给予人类幸福快乐健康长寿等承诺,而且还让每一个人越来越多地享受它所带来的益处,并越来越依赖于它。数据技术对日常生活的日益广泛影响,加速了社会中人文主义世界观向数据主义世界观的转变。数据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一种社会人文精神与世界观,成为一种“后人文主义”。所谓数据主义是一种“后人文主义”是指:数据主义借助传统人文主义而使自身成为一种社会人文精神与世界观,并进而取代传统“人文主义”成为“后人文主义”的;传统人文主义以人为中心,作为一种社会精神与世界观的数据主义的“后人文主义”以数据为中心。“一开始,数据主义可能会让人文主义加速追求健康、幸福和力量。数据主义正是通过承诺满足这些人文主义愿望而得以传播。”人类为了获得永生、幸福、快乐,愉快地将选择、决定权交给了算法。然而,“一旦权力从人类手中交给算法,人文主义议题就可能惨遭淘汰。只要我们放弃了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而秉持以数据为中心的世界观,人类的健康和幸福看来也就不再那么重要”<sup>[2]</sup>。

人类近代以来所确立起的“人文主义”文化价值精神,有可能在21世纪受到根本挑战。自由、平等、人权、人道、独立人格、个体价值及其尊严等基本人文精神,会受到“数据主义”的强烈冲击。数据技术可能会使人类失去存在价值:即使人类作为整体有其价值,个人也不再有价值;即使个人有价值,也只是那些“超人类的精英阶层”有价值,“一般大众”不再有价值。社会可能再次被撕裂为截然对立的两部分。人类历史上将首次出现“多余”的“无用阶级”,其因“多余”“无用”而无意义,精英将通过数据技术控制与支配大众<sup>[3]</sup>。这些令人思之极为不安。

然而,就在20世纪末,人类还基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对21世纪充满乐观。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就基于市场经济、现代科学技术进步提出了“历史终结”与“末人”概念。他认为人类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自由民主制已经确立,自由民主价值精神已被公认为社会基本价值精神;在价值精神的意义上,我们无法想象出还有比自由民主制更值得追求的制度;我们生活在人类的“老年时代”,历史在此终结。福山所谓“老年”时代、历史“终结”,不是否定性意义上的,而是积极肯定意义上的,是说人类进入前所未有的文明时代。那是一个因科学技术进步与市场经济而导致的普遍同质化时代,生活在这最高级时代的人是“最后的人”,即“末人”。当然,福山也警示人们须警惕“末人”在法治、和平、安逸生活状态中“人格平庸化”,没有“激情与胸膛”,提醒人们应当有社会责任意识与担当精

[1][2][3][以色列]赫拉利:《未来简史》,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18、42、59页,第352-353、356-357页,第275、286页。

神<sup>[1]</sup>。不过,仅仅过了20多年,福山就根据以DNA基因修饰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生命技术修正了自身的这一乐观看法,认为现代科学技术新发展正导致社会异质化进程,自由民主制连同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观,均有可能被现代科学技术颠覆<sup>[2]</sup>。

福山对科学技术社会功能及其人文意义认知的重大变化、赫拉利对21世纪人类存在意义的警示,以不同方式表明:21世纪的人类生存境遇注定前所未有的,以数据技术为代表的一系列重大科学技术革命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有可能使人类生存境遇发生颠覆性改变。人类真的会在“神人”面前成为“末人”吗<sup>[3]</sup>? 21世纪的人类向何处去? 我们应当为此做些什么? 如果我们不再是作为一个“人”存在,如果社会真的被截然割裂二分,极少一部分人通过数据技术控制、支配另外绝大多数人,那么,21世纪人类的前途何在? 如果我们真的只是成了“快乐生活”的“食客”,存在的“意义”又何在? 真的还有能力追求自由、幸福生活吗? 显然,这样一些问题,并非杞人忧天。对21世纪人类生存境遇的关切,是人对自身本质、本性永恒关切在当下的具体呈现。

## 二、数据技术可以彻底摆脱技术的局限性吗?

人类生存境遇不是新问题,伴随科学技术革命,社会出现新问题乃至人文危机,也不是新问题。新问题是数据技术为代表的新科学技术革命导致人类生存境遇发生颠覆性改变的风险,是数据崇拜、数据神话,以及由此所构成的“数据洞穴”问题。其实,近代以来,伴随着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进步,不仅社会日常生活方式会发生相应重大变化,人们对人性、人类历史观的理解也会有重大变化。

毫无疑问,数据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革命性、颠覆性的。它使人类的创造性活动达到巅峰,并能有效解决既往无法解决、也不敢想象能够解决的诸多问题。与此同时,社会也不可避免地滋生出一种社会文化:对数据技术无限崇拜,以为数据技术可以解决一切社会人生问题。这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崇拜科学并以“科学主义”取消“人文主义”思潮的当今再现<sup>[4]</sup>。问题在于:“数据技术”究竟在何种意义上不同于既往各种“技术”? 是否真的能够彻底摆脱“技术”的特质、局限? 我们是否清醒地意识到可能的风险并对风险有必要准备?

“数据技术”将一切理解为数据,人亦不例外,与此相应,“数据化”就成为一种普遍认知范式。“数据化”作为一种认知范式本身就表明此种新科学认知及其解释力的某种普遍有效性。数据化改变了人对世界的认知方式与“交道”方式,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统一世界。在这里,一切差别均消失了,一切都只是二进制数据,差别只在于二进制数据的具体构成;一切都统一在二进制数据中。一切存在之间的普遍联系不再停留于想象中,而是成为一种现实。缤纷繁杂的世界变得简单——简单化为数据与算法。数据与算法消灭了一切原本存在着的、似乎不可逾越的界限。更为重要的是,具有自我学习能力的数字技术,在持续迭代中有可能突破宇宙自然演进中的生物智慧极限,以超乎想象的速度与方式发展,具有前所未有的开放性与不确定性。不仅“智慧”不再为人类独享,而且“自由意志”这一人引以为尊的特质也面临根本挑战。既往的技术在总体上是外在的、某一领域的、局部性的,数据技术则越来越成为内在的、无所不在的,它模糊乃至消除了一切领域及其界限,其能力也有可能全面超越人类

[1][美]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陈高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09页。

[2][美]福山:《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黄立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6、182页。

[3]此“神人”是赫拉利意义上的,指具有“神的能力”的“超人类”的精英集团。此“末人”不是福山意义上的,而是在数字化智能趋势中失去主体性、自由意志、存在意义的“多余”意义上的。

[4][以色列]赫拉利:《未来简史》,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249页。

自身。这正是数据技术不同于既往技术之处。

然而,尽管如此,“数据技术”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技术”。技术究竟是什么?人们习惯于将技术视为人所创造的一种工具、手段。这是在抽象人的视野中将技术理解为人外在性的。其实,技术是人内在性的。所谓“技术是人内在性的”是指:只要不是在抽象的意义上,而是在现实的意义上理解“人”,那么,人内在地具有活动能力,内在地具有“技术”。一个完全缺失“技术”的人不是现实的人。作为“现实的”人至少有两重内在的规定:社会性与实践能力。社会性是指社会关系中的具体存在,只有在社会关系中,人才能成为真实、具体的人。然而,社会性只是揭示人的群体性本质。人要感性地存在并满足自己的需要、创造自己的现实生活、成为鲜活的人,则不可缺少活动、实践能力,不可缺少“技术”。“技术”使人从自然界中超越而出。人有自由意志,有自己创设的目的,人能根据自己的意志创造性地实现自己的目的,并在实现目的的活动中创造出新的目的。在此意义上,作为人的现实活动能力的技术就内在地成为人的一部分,人的现实呈现、展开在总体上都是某种技术性活动;技术并不是外在于“人”的所谓外在手段性的东西,而是内在于“人”本身的东西。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的下述思想是深刻的:反对对“技术”本质的工具性解释,认为“技术”是“真理”与“人”的本质的“展现”,是“座架”。“技术”不仅展现世界,亦“展现”人。“展现”即意味着限制、创造。技术不仅“限制”“创造”世界,亦“限制”“创造”人。海德格尔反对对“技术”的工具性解释,旨趣是要揭示技术本身的价值属性,是要追问在人的活动中究竟是“技术的意志”还是“人的意志”在起支配作用。海德格尔关于技术是“座架”的思想,要旨是强调人通过自身的创造性活动与人自身生活世界互构。技术本就是“人”的、“人性”的,离开“人”就无法理解“技术”,同样,离开“技术”亦无法理解“人”。在此意义上,“技术”不是通常所以为的纯粹工具性的,相反,它首先是人内在具有的创造性活动能力,是人呈现自身的方式,是人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它内在地具有人的价值属性。离开了技术的人的价值属性,就不可能真正深刻地理解技术。

作为人“内在性”的技术,意味着只要有“人”就有“技术”。这就可进一步逻辑地推出三个结论。

首先,技术进步并不能终结意义世界问题,而是在持续不断地产生出新的意义世界问题。技术进步确实可以成为人满足需要的方式,但是,一方面,任何感性存在的东西都是有限的;另一方面,技术进步是一个无限开放的可能世界,伴随技术进步会不断创造出新的目的、欲望、需要。这意味着,一方面,技术进步及其需要满足有可能使人陷入“恶的无限性”(黑格尔语);另一方面,技术进步的开放性过程本身就是持续地打开可能的意义世界,并对人性、人的存在方式不断带来新的刺激与改变。技术进步在解决某些既有问题的同时,亦会带来许多新的问题。以前述福山为例。福山在得出“历史终结”结论时,对现代科学技术有充分正面的评价,认为正是现代科学技术使得社会出现“同质化”趋向,它通过对人们“平等”人格身份的“承认”为现代自由民主制奠定基础。但是,此后,福山分析了DNA基因修饰技术可能导致的社会后果,认为DNA基因修饰技术可能导致社会“异质化”趋向,会通过刺激人性深处要求他人“承认”自己“优越”的欲望而毁灭现代自由民主制。最新技术非但不能终结意义世界问题,相反,会持续不断地产生出前所未有的意义世界新问题。

无论何种技术,均在解决某种既有社会人生现实问题的同时,创造出新的社会问题,数据技术亦不例外。数据鸿沟、数据权力、数据奴役、数据食客等等,正是数据技术给人类带来的新的重大人性、社会问题。“数据鸿沟”是因财富拥有差别而产生的在数据技术享有能力上的巨大差异,此种差异不仅是一般生存财富差异,更是人的无限可能生命、意义世界的根本性差异。“数据权力”是对数据技术及其具体内容的掌控而具有的特殊权力。“数据奴役”是基于“数据权力”而衍生出来的一种特殊社会奴

役方式,此种奴役方式可能以“温柔”的形式呈现<sup>[1]</sup>。“数据食客”则是因数据技术带来高效率,物质财富生产不再主要依赖人或人口红利,“多余的人”在社会福利之下衣食无忧,“体面”地存在,“快乐”地生活,不再关心意义,沉浸于日常“快乐”,成为纯粹的“食客”。这些问题既前所未有,又无法回避。

其次,人的能力及其发挥有其目的性,取决于自由意志及其选择。哈贝马斯在与马尔库塞的对话中,曾将意识形态区分为“虚假”的与真实的,并对现代技术进步的社会功能给予相当积极的评价。姑且不论哈贝马斯关于现代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功能的思想是否合理,仅就其与马尔库塞一样不否定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特质,并揭示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排除”了全部既有“道德”而言,他事实上深刻地揭示了一种社会事实: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本身已成为一种人文精神或一种用来作为价值辩护的社会精神<sup>[2]</sup>。今天,我们依然需要追问的是:科学技术为什么能作为“意识形态”存在?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为权力提供合法性辩护,但科学技术本身的合法性、正当性是否需要合理理由辩护?这种辩护与理由恰恰来自人文精神。正是人文精神给了“技术”活动以合理理由。“技术”离不开人文精神,“技术”内在地需要人文精神。技术确实具有手段功能,作为手段的技术有其不能及之处,它无法避免价值的“纠缠”。从技术角度看,技术问题本身最终须通过技术解决,不过,技术解决问题的前提是能将一切问题都变为技术问题——而这恰恰是严重存疑的。一方面,许多问题可以转变为具体技术问题,但是有些价值优先性及其选择问题可能无法转变为技术问题。如个人的爱情、偏好等情感、意志问题,就无法转变为纯粹的技术问题。另一方面,技术的根本原则、方向等所谓“终极目的性”内容,亦无法转变为纯粹技术问题。如自动驾驶汽车算法法则中的价值原则,当人们能够确定此算法法则时,它事实上已是一价值选择,而非纯粹技术选择<sup>[3]</sup>。

再次,无法将“人文”与“技术”截然分开。人的技术活动构建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并构建人性,任何技术活动都无法避免人文主义的价值关切。理想的技术活动应当构建起人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构建起社会公平正义、人们幸福生活的框架条件。但是,技术本身不可能自然造福人类。技术造福人类的价值取向来自作为主体的人的人文主义关切。随着人工智能自主学习能力的增强,人们强烈忧虑智能机器人征服人类的可能。这种“忧虑”情绪,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技术并非万能的,“科学主义”有严重局限性,而且本身亦是一种对人及其命运关切的“人文主义”显现。在此“忧虑”背后存在着的关键问题,不是技术的,而是人文的,不是人一机关系的,而是人际关系的、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至少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时间内,不是智能机器人征服、控制人类的问题(如果有的话,也只是表现得似乎是智能机器人对人的控制、支配),而是少数人控制、操纵其余多数人的问题,是那些操纵、支配、控制智能机器人的人,通过智能机器人技术支配、控制、操纵其他人的问题。人类所面临的新问题,在根本上仍然是老问题:价值观、人际关系、技术是否真正用来服务人类,人类应当拥有什么样的日常生活世界的问题。真正能够结束人类历史或毁灭人类的,不是智能机器人,而是人类自己。只要人类自己不放弃向着自由前行的价值方向,努力捍卫人的高贵与尊严,人类总是有希望的。人类会在技术发展过程中不断校正航向,寻找到走向光明的路径。未来的轨迹取决于我们的现实活动,我们有道义承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为未来开辟道路。

人类历史具有方向性,但人类历史不是宿命的。所谓历史的方向性是指:人有自己的自觉目的性追求,此目的性就是向着自由。打破各种枷锁,追求自由,向着自由奋力前行,构成人类的历史进程。赫拉利提出21世纪“数据主义”可能取代“人文主义”的本意是要告诫我们:人类由于自身创造性活动

[1]李彦宏:《智能革命》,〔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295-298、311-313页。

[2]〔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李黎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68-70、100页。

[3]高兆明、高昊:《智能机器人研发中的两个实践哲学问题》,〔北京〕《哲学动态》2017年第9期。

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些挑战关涉人类存在命运;人类在直面并迎接这一新挑战中走向自由。如果我们“拥有神的能力,但是不負責任、贪得无厌,而且连想要什么都不知道。天下危险,恐怕莫此为甚”<sup>[1]</sup>。反之,如果我们未雨绸缪,充分发挥“道德想象力”(杜威语),以负责任的态度从事现代科学技术的发明与使用,控制风险,踏实走好每一步,那么,人类就能进入自由的新境地。

### 三、人是算法吗?

“数据主义认为‘生物是算法’”<sup>[2]</sup>,人亦不例外。数据主义的这一认识并不新鲜。人是机器,人是会说话的动物,人是符号的动物,等等,都代表了不同时期人类对自身的某种认知。这些不同认知背后存在着的是同一问题:人究竟是什么?人凭借什么区别于万物?

人在何种意义上是“算法”?作为计算机专业的专门概念,计算机的“算法”概念界定较为繁杂,但其要旨是:在具体情境中为达到给定目的所设计的行动策略、方法。如果前述“生物是算法”是指生物在进化过程中有“适应”的“学习”能力,那么,“人”作为生物的一类确实有“适应”的“学习”能力,在此意义上,“人”与其他生物一样具有“算法”特质。如果“人是算法”中的“算法”是指利用机器语言理解一切事物,那么,在此意义上,“人”亦是一种二进制的存在。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上述两种“人是算法”的理解,均是从特定角度消除人与万物差别的理解。理智告诉我们,一方面,看待同一事物的不同视角有不同的规定;另一方面,万物之间既有相通处,又有彼此区别处。人究竟以什么区别于万物?人的本质、本体是什么?这恰恰不是“算法”所能回答的。这是哲学形上问题。

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人的永恒追问。人类一切形上之思,最终都要回到古希腊哲人所提出的认识你自己、成为你自己的永恒之思。康德认为理性所关注的一切问题可以归纳为四大问题。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我能认识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能希望什么”,晚年,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又加上“人是什么”(或“我是谁”)。“人是什么”具有总括性,前面的三大问题最终均指向“人是什么”。此“是”不是描述、实存意义上的,而是应然、价值、本体意义上的。人的全部活动都指向“认识你自己”“成为你自己”。世上最难认识的是“自己”。“成为你自己”以“你自己”“本是”怎样为前提。然而,“我们的永恒定理是‘每个人都最不了解自己’,——对于我们自身来说我们不是认知者”<sup>[3]</sup>。萨特曾有一思想:存在先于本质,人是其所不是,不是其所是<sup>[4]</sup>。人是其所理解的,人是其所欲是,人是其所应是。人、人生、人性是建构的——既是社会文化制度的建构产物,亦是自我理解的建构产物。对生活、意义、价值、目的的不同理解,会有不同的人性与人生。

康德将世界区分为“自然”的与“自由”的,人属于“自由世界”并服从“自由律”。“自由世界”“自由律”既将人与万物区别,又是人之崇高、伟岸处。人有人性,人得成为一个“人”,成为有“意义”的存在。人不同于智能机器人(或数据人)及其算法之处,就在于人有“人性”。借用康德的说法,智能机器人(或数据人)服从“自然律”,人服从“自由律”。人不仅有逻辑推理判断能力,有情感、意志,而且有意义世界,有明“天理”的“自由意志”能力,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有为了爱情、自由不惜一切的牺牲精神。至少在现有的认知范围内,这些构成了人与智能机器人的原则区别。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说人有“虚构的力量”,虚构创造了“世界意义”。赫拉利所谓人的“虚构”力量无非是在以特殊方式表明:人有意义、价值世界;意义、价值世界是人自身所创造的。人能够借以与万物相区别的,在根本上,既不是自然物质世界,也不是经验情感世界,而是意义世界。意义世界为人类独有。人类的伟大

[1][2][以色列]赫拉利:《人类简史》,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394页,第353页。

[3][德]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周红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页。

[4]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的第一章中,通过揭示“此在”的两个特征表达过类似思想。

创造能力缘于人的意义世界。就个体而言,其基本能力从石器时代以来没有多大变化,甚至还可能有所衰退。但作为类而言,人类“虚构故事”的能力在提高,人的意义世界在增强,人通过意义世界创造着自己的历史<sup>[1]</sup>。当然,“意义世界”本身有丰富内容,如日常生活中可经验感觉到的文字、货币、符号等,甚至空间、时间这些物理世界秩序亦成为意义世界的构成要素<sup>[2]</sup>,超验灵魂、永恒精神一类更是意义世界的核心。人“虚构”故事,创造意义世界,是为了人类自身。未来世界究竟怎样,说到底也是“虚构”的产物。它依赖于我们对未来世界的理解,依赖于我们对未来世界的意义赋值,依赖于我们对当下活动的理解,依赖于我们在对与未来世界与当下活动理解基础之上的创造性活动。赫拉利提出“未来简史”“智神”概念,就是在“虚构”人类的21世纪,理解人类21世纪的可能意义世界,就是在刺激我们一起去“虚构”并直面21世纪人类的可能生存境遇挑战,进而理解我们当下究竟应当怎样做。

然而,令人不安的是,意义世界越来越不为人们所重视。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科学理性日益盛行、价值精神日益式微、敬畏感日益缺失的时代。人们天真地以为数据技术可以解决人类社会生活中所遇到的一切重大问题,诸如饥荒、瘟疫、疾病、环境污染、老年化等等,数据技术使人类越来越自以为无所不能。用赫拉利的的话来说,现代性是一项“契约”“交易”,“人类同意放弃意义,换取力量”。人类不再有所敬畏,相信数据技术力量能够创造一切、解决一切问题。确实,数据技术令人享受现代生活,令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便捷、舒适。饥饿、疾病、衰老、死亡等人类所恐惧的现象,似乎正渐渐远去。人类似乎有了前所未有的幸福生活。但是,更快、更好、更大、更多的外在追求,使人永不满足。人类的贪婪正被充分激发,随之而来的是“焦虑”<sup>[3]</sup>。由黑格尔所提出并为马克思极其重视的“异化”思想,今天仍然具有强大解释力。应当警惕数据技术逸脱人的控制,成为“野马”。在意义世界中,那些外在符号、物等只不过是人类社会为了自身福祉创造出的东西;数据技术应是人性的展示,数据技术应属于人并回归人,而不是相反。正是这些永恒求真的探索精神、满足自身幸福生活的超越性追求活动,使人超越其他动物,成为大写的“人”。将人数据化,将人理解为“算法”,将人的一切交给“算法”,不是在提升人类,而是在矮化人类。

#### 四、人类还须坚持“自由意志”吗?

能否坚持自由意志,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虽然这种挑战本身属于哲学问题,但却基于现代数据技术<sup>[4]</sup>。赫拉利根据现代脑科学成就提出一种观点:21世纪,人在向“智神”转化过程中有可能不再拥有“自由意志”。因为人的一切具体行为都是大脑神经的电化学反应结果,而此电化学反应则是生物进化的结果。人们通常以为是自由意志的行为,不过是基于生物进化形成的生物机制的“随机事件”。一个人“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特定基因构造让大脑出现某种电化学反应,而基因构造反映的是从古至今的进化压力及突变的结果”<sup>[5]</sup>。赫拉利所述的观点值得警惕。

其一,在哲学上有双重理由坚持人的自由意志。一是存在本体论的理由。如果否定人的自由意志,人何以与万物相区分?一是规范论的理由。如果否认自由意志,则意味着人无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既有一切社会规范(法律的、道德的)均将失去存在理由,既有的社会秩序及其治理方式都可能发生颠覆性改变。不仅如此,我们每一个人亦不再有引以为豪的“成为一个人”的尊严感。至少在目前知识与哲学的双重意义上,我们不能放弃“自由意志”这一前提。否则,人将非“人”。

[1][3][4][5][以色列]赫拉利:《未来简史》,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133、137页,第179-181、196页,第274页,第254-257页。

[2]建筑设计中显现权力的空间在“上”,如庙宇、皇宫的高大巍峨;在各种类型集会中显现权力的时间在“后”,如权威人物的出场时间总是在后。

其二,毫无疑问,人的一切行为有其生理生化机制。当我们能够说“自由意志”时,一定是以正常人的生理生化机制等生物特性为前提,如果离开了这一前提,无所谓“自由意志”。但是,不能将人的一切行为简单还原为生理生化过程。不仅此生理生化反应机制仍然有待探索,而且更应当区分“动作”与“行动”。脑科学、电化学反应等实验所揭示的是“动作”,只要给予某种刺激或化学物质,就可以有某种特定“动作”,这是简单的生物刺激反应。但是,“动作”不是“行动”。“行动”是由意识、观念所支配的完整过程。

其三,如果“人不再有自由意志”是在下述意义上而言,科学技术发展到那种程度,以致“各种超级实用的设备、工具和制度……并不允许个人自由意志的存在”<sup>[1]</sup>,那么,问题恰恰更值得我们警惕。它向人类提出的真实问题是:如何负责任地创造与使用此类设备、工具和制度。就当今最为热门的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领域而言,马斯克(Elon Musk)、哈萨比斯(Demis Hassabis)是两位杰出代表。哈萨比斯只是疯狂地致力于发明人工智能技术,马斯克则因意识到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担心其给人类带来毁灭性后果,力图研究更安全的人工智能技术,并要求政府加强监管。哈萨比斯是要努力创建出令人震撼的建筑,马斯克则意图先行设立“房屋火灾保险”,监控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避免人类的可能浩劫。他们二者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不同看法,基于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风险的不同理解与态度。更为重要的是,就人类而言,他们二者的这种理解、态度,事实上构成了人类在现阶段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一种反思性平衡。

数据技术是人类自身自由意志创造活动的产物。人的不同活动动机、行为选择,直接制约乃至决定了数据技术的社会功能,是人的自由意志活动构建出人类历史的可能世界。坚持人的自由意志并不意味着主张人可以为所欲为,而是要求坚持人的责任。充分评估可能的社会风险,以风险可控为前提,将数据技术置于人类的有效控制之下,谨慎、稳妥地向前推进。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 五、走出“数据洞穴”

柏拉图的“洞穴隐喻”是西方思想史中的经典隐喻。我们每个人都会处于某种“洞穴”之中,并始终有探索走出“洞穴”的使命。卢梭曾说我们无不处于枷锁之中。此种枷锁既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打破思想枷锁,追求真善美,走向光明,这是人的使命。21世纪的人类仍然应当坚持人道、自由、民主、平等基本价值精神,仍然应当有道义担当、使命意识与责任精神。

当今人类当然以数据技术为豪,数据技术前所未有地解放了人。然而,如同“未经审视的人生不是真实的人生”,未经反思的数据技术不会真的给人类带来巨大福祉。我们在发明、使用与享受数据技术的同时,一定不能放弃对数据技术的反思,一定不能忽视数据技术可能给人类带来的巨大风险,一定不能将“数据主义”当作当下的“人文主义”,一定要警惕“技术的解放转而成了解放的桎梏”<sup>[2]</sup>。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正处于“数据洞穴”中:相信数据技术能够解决人类社会一切问题,可以使人长生不老,可以坐等财富涌流,可以有不流血的战争,等等;我们正尽情享受数据技术带来的一切成就,在人的福祉、幸福、自由的名义下无反思地将数据技术视为人类终极拯救者,并将自己的命运越来越放心地交给数据技术。

有一种意见认为:数据技术使政府能够及时准确了解信息,完全有可能计划周密地安排经济、社会活动。如果此种意见只是强调大数据可以有效克服社会信息混乱、片面、不及时,进而可以有效加强社会宏观管理,则不失为合理。但是,如果言外之意是经济、社会发展可以完全依赖政府“有形之

[1][以色列]赫拉利:《未来简史》,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274页。

[2][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中译本序第4页。

手”,市场经济终于可以在数据技术面前退出历史舞台了,那么,则应当保持高度警惕。一方面,这种观点正是在社会经济、日常生活层面对自由意志否定的显现;另一方面,也正是数据权力及其支配无所不在的显现。这里存在的哲学问题是:其一,数据技术是否能够彻底消除偶然性?离开偶然性的世界意味着什么?难道真的没有偶然性的世界吗?其二,数据技术是否真的克服了人的“理性不及”(哈耶克语)?如果真的能够克服,那么社会的活力与创造性从何而来?数据技术不能被神化,不能成为悬在人类头上无所不能的神明,更不能成为支配人类社会的绝对权力。

“数据主义”不能成为21世纪的“人文主义”。21世纪的“人文主义”仍然应当是以人为本的。至少人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那样的想象力,能够建构较之人道、自由、平等、民主、公平正义等更值得追求的意义世界与价值目的。当然,21世纪的“人文主义”,会在以数据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及其变化了的生活世界中,有新的具体理解与具体实践样式。正如赫拉利在《未来简史》最后所说:“我们无法真正预测未来,因为科技并不会带来确定的结果。同样的科技,也可能创造出非常不一样的社会。”“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的兴起肯定将改变世界,但并不代表只会有一种结局。”<sup>[1]</sup>同样的科学技术究竟会创造出何种社会、带来何种结局,这在根本上取决于受到何种人文价值精神的引领。

所有在“洞穴”中的人们都面对洞壁上的影子认真探究、寻索,他们似乎都在从事思想活动,并自以为所知所获均是事实、真理。“洞穴”中总会有一些人在某种好奇、探究、怀疑心的驱使下,勇敢地走出洞穴,去探究那洞外的光明世界,发现那天空的太阳。求“真”是去蔽、解蔽过程,它需要独立思考与怀疑批判精神。真相、真实、真理是可辩论的,而不是独断的。“洞穴隐喻”中的哲学智慧之光,启迪我们追求真善美,守护人文情怀,抑制贪婪,严谨求实。能够引领我们走出“数据洞穴”,进而拯救人类,使人类避免毁灭性风险的,只有我们自己。

21世纪科学技术对人性、人的交往方式、社会政治结构、人类命运与未来的挑战,可能是难以想象的。责任感、使命感、担当精神与家国事业情怀,可以引领我们谨慎地摸索前行,避免可能的毁灭性灾难。人类未来的希望就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如此行动中。在当今时代,从事高技术创造活动,首先应当有社会责任意识。并非一切“能做”的都是“应做”的<sup>[2]</sup>,须防控风险,避免鲁莽地打开“潘多拉盒子”。不仅要有造福人类的主观想法,更要将此想法在高技术活动的每一具体环节合理显现。不能以主观动机代替可能的实际效果。高科技企业等不能名义上要为大众谋幸福,事实上谋划主宰大众命运(诸如,高科技企业说是为大众设计更好的DNA组合,要为各种智能机器提供更好的算法,要制造出更好的生物化学药品,让人们生活得更好、更幸福,但事实上却将大众视为庞大实验室中的“小白鼠”并加以控制)。如果真的那样,就会陷入赫拉利所警告的危险境地:社会由少数精英控制,普通大众不再是自由的“人”。

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不能没有好奇心与勇气,也不能没有敬畏心。人有敬畏心才不会狂妄自大,才可能得救。人在展现自我的创造性活动中须有责任意识,应当谦卑谨慎,控制风险。这正是康德“浩瀚星空,位我头上;道德律令,在我心中”这一著名格言留给我们的永恒财富。

[责任编辑:洪峰]

[1][以色列]赫拉利:《未来简史》,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357-358页。

[2]参见高兆明:《技术祛魅与道德祛魅》,[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